



- 美国记者评周恩来
- 高效而廉洁的新加坡政府
- 末代沙皇一家是怎样被处决的？

天下大事纵横谈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天下事》丛书编委会



- 科马内奇浮沉史
- 人类能找到外星人吗？
- 到处挖古墓的“超级瘟疫”
- 是谁亲自策划了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

天下大事纵横谈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天下事

丛书编委会 编译

责任编辑 刘玉军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焦作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20开本 7.4印张 215千字 插页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215—01128—3/G·155

定价：2.90元

内容简介

我们注视着世界，世界也注视着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为有利于大家更直接和更清晰地眺望世界，我们现在从海外的数以百计的报刊中，选取并摘译了一些新文章，汇编成本书。我们谨具一炷心香，希望这些生动耐读而亦启思广智的篇章，能成为亲爱读者的良伴。《回忆周恩来》是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新作中的专章，《葛罗米柯谈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会见》则是他的回忆录中的章节，名人名笔，叙事纷呈。1989年初，前者在国内有简短译文出现时，读者纷纷求索，本书刊出的是详尽的译文，当能满足读者的巨大兴趣。

我们还要特别提一下关于战前日本历史上的两篇秘录，它们以详实的根据揭示了日本发动侵略的一些人所罕知的内幕，它们是我们应当知道的。中日友好是永存的，而了解历史真相则是友好的不可缺的坚实基石，这样的基石的每一块都应当好好放着，是不应当被忽略的。《现代吴刚登月记》是美国宇航员自述的登月实录。它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这一壮举的全过程，读后令人大开眼界，津津有味。文章虽长，我们不忍割爱，未作多少删节。《人类能找到外星人吗》和《深海奇兵》也不失为两篇科学上的佳作，深入浅出，生动可喜，都能为我们打开一些新鲜视野。与此同时，我们并刊出有关“特异功能”的两篇文章，它们的观点是不同的。我们希望，这种如何正确认识并科学研究“有关特异功能”现象的问题能有所裨益。

《我的父亲林语堂》是林语堂次女林太乙的长篇回忆，缕缕言来，亲切有味。近十年来，我们对这位具有国际声誉的中国作家所知变得颇少了。这篇忆述对他的人品、文品，对人生的看淡，对事业的执着及其家事和亲朋等等都有可珍的介绍，知孰论世，亟宜一读。本文刊载的关于胡适、张恨水两先生的文章，则充分介绍了他们生活上的重要侧面，足以显示出他们为人的风貌，也是很值得一读的。

目 录

美国记者评周恩来	1
世界难题六十三，请君共商如何办？	6
南斯拉夫领导人收入知多少	12
尚未解决的八大科学问题	13
现存国王知多少，掌有看权知几人	15
高效而廉洁的新加坡政府	16
末代沙皇一家是怎样被处决的？	18
一位苏联百万富翁的自白	21
卢布“惊魂”——猖獗的苏联黑市兑换	23
苏联研制返老还童药成绩显著	26
亲赴香港探防务，朝鲜志士图绑架	27
——七十年前裕仁的一段秘史	
是谁亲自策划了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	29
美国联邦住房部的舞弊丑闻	33
作个纽约客的麻烦事	36
美国富豪百态	37
外国知识分子的工资情况	39
科马内奇浮沉史	41
加拿大爆各国运动员服用禁药情况	43
现代吴刚登月记	46
人类能找到外星人吗？	58
世界各国大奖一览	60
深海奇兵	61
恐龙未灭绝，后代变鸟儿	64
白宫与特异功能	67
特异功能“千里传功”的一次有趣测试	69
耶稣受难新考	72
恩爱夫妻谈性爱	76
神州“扫黄”大风暴	78
大陆“扫黄”书目	80
到处挖古墓的“超级瘟疫”	81
上海机场难忘的迎接	84
中国留美学人综览	87
“中国功夫”在美国	90
欧洲的唐人街	92

李登辉的“根”在何处?	94
宋子文 1931 年遇刺未死揭秘	95
胡适的封建婚姻与情场聚散	100
张恨水与《啼笑姻缘》	105
我的父亲林语堂	110
日本皇室的灰姑娘	121
美国的技术王牌	122
梁实秋最后遗稿:清秋琐记	124
戴安娜王妃三年生下两王子	125
大陆文物走私何以屡禁不止	126
陈香梅给蒋经国夫人的一封信	128
蒋宋孔三大家族的今天	129
中国国歌史	131
葛罗米柯谈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会见	133
越南高台教,东西大糅合,雨果孙中山,并肩封为神	135
李登辉的副手李元簇	137
谁来挽救地球	140
苏联科学为何落后	143
提防舞厅里钻出蛇来——海外老报人梁厚甫论当今国际形势	146

封面说明: 上: 一块陨石在法国昂西赛姆城
被视为“镇城之宝”。
中: 冲浪者。
下: 西班牙三军统帅。

封底说明: 上: 塞内加尔的节日。
下: 美国摇滚乐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和他堪与当今美国总统警卫队相匹敌的保镖队伍。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美国记者评周恩来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的名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合众国际社派驻伦敦、中东和苏联工作；1949年加入《纽约时报》后，派驻莫斯科6年。此后，到东欧、蒙古、越南等国采访。其报道曾获普利兹新闻大奖。

索尔兹伯里从1959年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中国；1972年以来，多次来华访问。1987年再次来到中国，进行广泛的旅行和采访，写出了在国际上有较大反响的《长征》一书。不久前，索尔兹伯里又推出新著《变革的时代》，其中第25章专述了关于周恩来总理的一些往事，引起读者很大兴趣，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趣闻。1989年1月9日《参考消息》简要摘登，引起读者很大兴趣。本文系该章的详细译文。

★ ★ ★ ★ ★

我想，他的动作犹如一头狮子，雄健有力，曲伸自如，灵活迅速。一双黑色的眼睛闪烁着点点金光。他举止文雅大方，机敏和睿智，常像插上山鹰翅膀一般，在他的头脑中突然闪现。他的双手很敏感，唇角却显出钢铁一般的冷峻。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出身于中国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的周恩来、共产党中国的总理。从1965年到1975年的将近10年中，周恩来凭借自己的柔韧灵活和钢铁般的意志，使他的国家免于堕入深渊。

1954年7月28日夜晚，我在莫斯科的斯皮雷多诺夫卡宾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当年的形象，如同用凿刀一般，镌刻在我的眼底。他当时56岁，满头乌发，面部光润，两道浓重的黑眉，双目炯炯有神。周是在参加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举行的招待会。我仔细观察了周半个小时，发现他一刻也未止步停留。他来回走动，在人群中

自由潇洒地穿行，一会儿与宾客们聊天，一会儿又与俄国佬逗趣；有时像《美国电影明星》派克扮演的那些角色，有时又好似西天如来一般严肃。就像埃德加·斯诺、西奥多·怀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美国人一样，第一次见面，我就对周恩来产生了敬慕之情。

1954年7月是周一生中的一个胜利时刻。他当时正从日内瓦开完会回国，在那里，他经过与有关方面谈判，达成了结束印度支那冲突的协议（这一结束仅是暂时的）。在那天晚上的招待会上，站在周恩来身边的是越南总理范文同。在12年之后的越战期间，我曾在河内再次见到他。在50年代的那个晚上，范文同寡言少语，似乎不愿抛头露面，如果说周恩来是颗彗星的话，那么范文同就好像是它的难见踪迹的彗尾。

这天晚上的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而且我后来发现，它也未从周恩来的记忆中消失。我在重温这一美好时光时，心情颇为愉快；然而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却夹带着一种伤感。这倒不是由于他当时与俄国人开的那些玩笑，而是因为他劝说范文同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之后，越南的局势发生恶化。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那天晚上，周恩来像马驹一般活跃，与俄国人不停地打趣。招待会是由神色严肃的莫洛托夫主持的。他从列宁1924年逝世之后从来就没有放声大笑过。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出席了招待会，其中有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马林科夫后来因“缺乏当总理的经验”而辞职，被贬到哈萨克斯坦去当一个水电站的负责人。米高扬面色黝黑，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正像他的同事们常常描述的那样，如同一个亚美尼亚的商人。在场的还有当时尚未被赫鲁晓夫废黜的卡冈诺维奇，他身材高大，肩宽体阔，面色沮丧。还有布尔加宁，他像通常一样多饮了几杯酒。出席招待会的还有英国、印度和瑞典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因为这

些国家已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当时并没有被邀请加入招待会的“核心圈”，但我却用记者的方式从一个客厅挤入另一个客厅，一直走到核心中的核心，即政治局委员们聚会的招待厅。一个便衣保安人员挡住了大门，但我可以从他的肩膀上向内窥视，因此耳闻目睹了厅内发生的一切情况。我的两耳可是灌满了新鲜事儿。

周恩来在厅内四处走动，与俄国人觥筹交错。可他既不讲汉语，也不说俄语，而是用英语说“干杯！”他的主人们无人听得懂，听懂的只有那些西方国家的大使们，还有倚在门边上的我。

主人显得有些不悦。“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呢？你是很精通我们语言的呀！”米高扬通过翻译问。

周恩来反问道：“米高扬，你为什么不学汉语呢？我已经学了俄语啦。”

“汉语是一门难学的语言。”米高扬抱怨说。

“汉语可并不比俄语难学呵，”周恩来迅速应答，“如果你每天上午到中国使馆来，我们将非常乐意教你学汉语。”

对外交礼仪不甚谙熟的卡冈诺维奇立即火了起来，嘟哝了一句骂娘的脏话。周恩来没有动怒，而是继续用英语侃侃而谈，他的话被灵巧的中国译员翻译成俄语。“你们这些人可没有借口（不学中文）呵。”周说道。然后，他转向彬彬有礼的外国使节，向他们敬酒。

我感到十分惊诧。我不明白周恩来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还是对俄国的沙文主义感到厌倦，他似乎认为中国在日内瓦的国际舞台上初次亮相之后，俄国人应当平等待人了。我怀疑后者是真正原因。周恩来当时相信，中国在日内瓦取得了一次成功，因为谈判结束了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他似乎在暗示，中国今后还会获得更多的胜利，中国已经不再是苏联老大哥的小兄弟了。

那天晚上的招待会还反映了当时的

许多“暗流”，其中之一就是周恩来为会见杜勒斯并战胜了他而感到骄傲。关于这一点，我在周逝世之后，从王炳南处了解到不少内情。王是当年陪同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一位年轻有为的中国外交官。

王炳南当时负责会议筹备工作。新中国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之后，一直与世隔绝，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她第一次在国际社会中露面。周恩来决心要让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表现出她的成熟和处事有方，因而要求中国代表团必须衣冠得体，并事先弄清楚各种注意事项。王炳南找到北京最好的服装师，为每个成员订做一件严肃庄重、尊贵体面、长至膝盖的黑色外套以及与之相配的长裤。当这些中国人第一次在日内瓦湖畔散步时，当地一些瑞士人竟向他们脱帽鞠躬。后来，中国代表们才知道，好心的当地人把这些身着庄重的黑礼服的绅士们错当成来自中国的一个宗教代表团。

王炳南告诉我，国际上曾经流传的所谓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说法完全是讹误的。周恩来从未主动与杜勒斯握手，相反，周曾指示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以及各地的中国外交官不要与美国人握手，除非美国人首先伸出手来。这条规定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直被严格遵守。不仅如此，王炳南还专为中国代表团从驻地前往会议厅选择了一条能够避开杜勒斯的路径。如果周恩来碰巧看到杜勒斯接近的话，他会很快走开，这样就可以避免双方非正式接触。

但是，王炳南说，美国代表团中的第二号人物沃尔斯特·比德尔·史密斯却没有依照杜勒斯的刻板教条行事。史密斯曾对记者说，美中双方在日内瓦接触最多的是卫生间里的卷轴卫生纸。可是在杜勒斯返回华盛顿之后，史密斯和周恩来有一天在代表休息室里相遇。两人进行了短暂的交谈，但当时不可能握手，因为史密斯一只手拿着雪茄烟，另一只手端着一杯咖啡。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史密斯找到了周恩来，说他非常高兴能与周会见，并表示十分推崇中国的文化艺术。他当时也并未与周恩来握手，但他抓住并多次晃动周的胳膊，以强调他个人的友好情感。

当我再次见到周恩来时，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已随着岁月流逝过去了。对那一时期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在当时只是略有所闻（有的只是毫无所知）。其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百花齐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批老干部下台乃至被整死，还有“乒乓外交”、基辛格1971年秘密的北京之行以及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直到此时，我才来到中国，再次见到周总理。周总理邀请夏洛特（注：索尔兹伯里夫人）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这是当时中国能够给予的很高的外交礼遇。我们当时被通知从西安乘火车赶回北京，因为中国人不相信民航能保证我们按时到达。直到与周总理共进晚餐的前几个小时，我们才得到确切的通知。我们一整天都呆在旅馆里，时刻盼望着来电话通知我们去见周总理，因为从某些暗示和礼仪安排上，我们已猜出了何事将要降临。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以来，他已历经沧桑。依我所见，在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时候，周恩来看来似乎是中国领导层中唯一头脑清醒的人了。他看上去比过去显得苍老，但神态自若，并且同当年在斯皮雷多诺夫卡宾馆时一样充满自信。夏洛特发现周的外套少了一颗纽扣。我后来还听说，周总理在晚上参加宴会或政治会议之前，经常来到离天安门不远的北京饭店的厨房里，匆匆吃上一碗热汤面，因为他在参加这些活动时，往往忙得顾不上吃一口饭。

我当时并不知道，在文革期间，周总理曾被一万多红卫兵示威者围困在人民大会堂里，也正是这批红卫兵迫使周的许多战友坐了“喷气式飞机”。周总理与这帮造反派激烈地辩论了24小时，

最终说服了他们放他离去。

在那天的晚宴上，周总理温文尔雅地坐在绣着古代神奇图案的屏风之后的圆桌旁，周围是一言不发、行动利落的招待员。周高兴地用象牙筷子品尝着不知名的菜肴。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主人近几年来一直在生与死、尊严与屈辱之间走钢丝，保持平衡。我敢肯定，中国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周曾一度救了长征中的英雄贺龙夫妇的性命；他曾将著名作家丁玲转移到东北的一个偏僻的军营中加以保护；他曾竭力减轻倒台的党的领导人刘少奇所遭受的磨难，但却爱莫能助；他曾将一位受到威胁的外交官送到农村保护起来，以免遭红卫兵的迫害；他曾提醒一位已被揭发的部长在风暴来临之前去寻找隐蔽之所——没有人比周恩来更能经常想出妙法来救护自己的同志及他们的子女了。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像到，在长征战斗中的许多战友、老一辈的党的领导人、鬓发斑白的军事指挥员，竟会在文革中惨遭折磨，甚至被杀害，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妻子儿女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然而这一切在周恩来那天晚宴的举止言行中却毫无迹象可察：他彬彬有礼，应答如流，对夫人女士们十分尊重。他在诙谐风趣而偶带有严肃的谈话中显得轻松而随和，充满了魅力和活力。周总理说，这天的晚宴使他回想起延安的黄金时代。在30年代，周曾在陕北的窑洞里第一次了解到如何同美国人愉快相处，并从他们天马行空般的谈话中获得乐趣。

当我将1972年6月16日见到的周恩来与他过去的经历，以及在他和毛的生命最后4年中的所作所为加以比较，我的困惑增加了。

我和其他人任何人当时都不知道，1972年是周恩来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好年景了，因为此后不久，他便被诊断患了癌症，不能久留人世了。这一绝症使他无法再为中国源源不断地奉献自己的

精力。

尽管我对中国政治的复杂性、隐蔽性和神秘性了解有限，我仍然知道，毛的法定接班人林彪之死使周恩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力。在周总理亲自揭穿了林彪的诡计并敲响了警钟之后，林彪在蒙古机毁身亡。在林彪出逃的那个晚上，周总理无论从神情表现还是从实际行动上看，都如同一名指挥员。人们很容易相信，周无所不知。在1934年之后的近50年中，周恩来一直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泽东。

1972年的那个夏夜有些闷热，参加晚宴的人在周总理的带动下，解去了领带，脱掉了外套。我们谈了些什么呢？我们几乎无所不谈！参加宴会的有8名中国人和91名美国人，其中包括象费正清夫妇这样的“中国通”，也包括夏洛特和我这样的新人，还有达德曼夫妇。我们谈到请中国大陆学生来美国留学，他当时没有料想到，若干年后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学生和台湾学生挤满了我们的大学校园，自由自在地相互交流。周恩来一直点着香烟。他谈到了尼克松，认为不论美国人怎么想，尼克松在中国毕竟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他谈到了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在谈到越南战争时，我说，美国一开始就不应该发动这场战争，美国什么时候想停战，这场战争就会结束，周对这些看法表示赞同。在谈到朝鲜战争时，他引用了美国将军们的话，认为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周的思绪在他的经验的天地间遨游，他把偶然性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哲理化了，尽管他在口头上也说到马克思关于经济和社会变革必然性的理论。他认为，机遇巧合非常重要：毛泽东建议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是机遇巧合，因为当时碰巧与东京电话联络很通畅，而且恰巧在美国人准备乘大轿车去机场返美之前把邀请访华的信息传到。

1936年12月国民党的年轻将领们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也是机遇巧合，因为如果蒋当时不去西安组织一场反共运动，这样的机会也就不会出现。中国在1971年而不是像他预料的那样在1972年加入联合国，也是机遇巧合。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而必然性则是通过偶然的机会来实现的。”周总理解释道。

我认为，周恩来仅用寥寥数语即把中国的辩证法观点作了概括：讲究实用，强调感知，没有学究气，马克思的理论不错，但运气也帮了大忙。不错，俄国人搞共产主义，中国人也搞共产主义，但他们的思维方式泾渭分明。

没有人在当时就能对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的岁月作出估计。在我们宴会的一年之后，周已被查出患病（但尚未出现外部病症）。有一次，周宴请他的老朋友切斯特·朗宁。据同时参加宴请的伊菲吉妮回忆，为了使谈话轻松，总理询问了她的家庭情况。伊菲吉妮告诉总理说，她的子孙后代中有各色各样的血统，“唯独没有中国血统。”

“我怎样才能得到一个中国人呢？”伊菲吉妮问道。总理的回答是不知道。

在伊菲吉妮的记忆中，周恩来是位风度翩翩的骑士，既没有患病的样子，也没有为世事纷扰的迹象。那一年，周的权威尚未遭受损伤，他调回了流放在外地的邓小平，让他分担自己的工作重担。但不久之后，毛的夫人江青和“四人帮”的其他几个成员便磨刀霍霍，反扑过来。迫害之风再次兴起。在狂热的中国“权力走廊”之中，第一次传出了批“孔”——即批周恩来的窃窃私语。

1975年6月9日，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起身，参加了他长征中的战友，大英雄之一贺龙的葬礼。尽管周尽了最大努力，贺龙最终还是被折磨致死。这一天周恩来身体十分虚弱，双手抖动不已，几乎无法在吊唁簿上签字。他对贺龙的

遗孀薛明说：“我没有能够让他（贺龙）免受伤害。”说到此处，周总理的话音颤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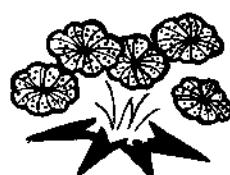
周躺在病床上，死亡在向他逼近。可是，“批孔”运动仍然甚嚣尘上。周请求为他再次演奏一首红军将领肖华撰写的长征歌曲——“不，不行！”江青摆出慈禧太后的架势命令道。

周躺在病床上，死亡在向他逼近。毛泽东没有前往他的病榻去探望。周于元月9日去世。毛也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江青参加了追悼会，但却随便地穿着一件连带手套的毛衣。当天晚上，江青在她西山住处放映了两部她最喜爱的西方电影。

当4月的清明节——这一扫墓祭坟的假日——到来之际，中国闹腾起来了。数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去悼念周总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堆满了山一般高的花圈，墙上贴满了成千首诗歌。然而4天之后，警察们半夜出动，取走了所有花圈，撕下了标语，清洗掉口号，同时毒打、逮捕了守护花圈的人们。

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取缔了，他的得力助手邓小平也再次被撵下了台。“四人帮”掌握了极大的权力，——然而，这毕竟只是短暂的一瞬。毛泽东9月9日谢世，中国再次肯定了周总理的地位。“四人帮”被逮捕、审判，关进了监狱。邓小平回到了北京，重新掌权。人们称赞周恩来是中国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他坚持了自己的信念，毕生为人民和革命事业服务。○

（刘江译）



爱德华·科尼(世界未来学会主席)

世界难题六十三， 请君共商如何办？

美《未来学家》杂志 1990年1—2月号 美文

90年代，世界将面临一大堆难以轻易解决的问题。就全世界而言，这些难以处理的问题的数目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无数的弊病将对人与人的关系和制度造成损害。

在自然环境方面，成千上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在人类社会，数千个种族和宗教集团正在为敌对的世界中求得生存而斗争。科学每天都在环境、食物以及技术方面发现各种新危险，而技术造成的问题似乎经常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20世纪人类遇到的问题正以加快的速度扩散着。因此，90年代很可能是人类所曾经历过的最充满忧虑的十年。但是，有更多的事情令人担忧实际上并不是件坏事。令人担忧的问题日益增多是一种进步的迹象。随着我们对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了解得更多以及生活条件得到提高，我们会发现更多的令人担忧的事。人们不必灰心丧气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世界面临的每一个问题都会有许多潜在的解决办法。

谁也说不上90年代世界会出现多少问题。在整个90年代，世界面临的绝大多数大问题将与我们一道继续存在，因为这些问题没有轻而易举、不花代价的解决办法，而且我们所采用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会产生新的问题。然而，有少数几个问题将会消失，例如在90年代，数千种稀有的动植物物种可能被消灭，从而会“解决”设法拯救它们的问题。

尽管令人忧虑的问题非常之多，但是还没有出现一门忧虑学。因此，我们不可能去请教一位“忧虑病学专家”，要求他提供关于什么是要担忧的问题的指导。但是，也许这样一门科学在未来岁月里会出现；因为在90年代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的数量肯定会增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们在下面把目前所能想到的难题开一个清单，让我们一个个看下去。

国际紧张局势

1. 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目前出现了缓和，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在90年代仍然是时时存在的一种可能性。苏联和美国仍然拥有具备核或热核能力的庞大的火箭、飞机和潜艇系统。超级大国间的一次核“交锋”所带来的恐怖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以致无法加以形容。但是，仍然还没有找到彻底消除这种威胁的办法。

2. 核扩散：有更多的国家正在缓慢但不断地获得制造原子武器的能力，因此，有些国家有朝一日可能使用它们来进行军事冒险。国际社会还没有找到制止扩散这些致命武器的办法；事实上，防止核扩散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困难了。制造原子装

置的基本方法现在已广为人知。大学生已在图书馆中找到绝大部分所需要的情报。

3. 恐怖主义：许多（恐怖）集团发现，通过爆炸、暗杀和绑架便能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专家们预计，尽管安全措施越来越严密，恐怖主义在未来的年头里将会增加。

4. 文化的丧失：现代的联系工具增加了要求在全世界采用共同标准和共同语言的压力。米制在不断取代当地的度量衡单位，英语也越来越成为世界性语言。但是，为实现标准化而采取的行动正在使文化大大丧失其丰富多彩性，而当说法语的加拿大人为保留他们的语言展开斗争时，标准化甚至造成政治动乱。

5. 对海洋的所有权：各国一直在扩大它们对近海海洋区的所有权。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濒海国家最终将把海洋瓜分掉。按照惯例，海洋国家都主张“海洋自由”的原则，这意味着任何国家都能利用海洋从事航运或占有可能发现的任何鱼类或其他资源，但是，商业公司不会愿意投资来开发海洋资源，如果它们对开发了的地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的话。在 90 年代，因海洋资源所有权而发生的冲突必然会被越来越尖锐。

脆弱的经济

6. 金融市场混乱失调：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日益下跌的美元比价使国际金融领域普遍呈现不稳。千百亿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在各国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越过国界来回流动。脆弱地加以平衡的体系如果出现突然的变化，就有可能导致国际经济发生崩溃。1987 年 10 月 19 日的股市崩溃，几乎使美国银行系统垮台，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有可能造成一场世界性的大萧条。

7. 贸易政策：雇用成千上万名工人的老行业，由于出售从别的国家进口的商品而可能被迫倒闭。但对进口品施行的各种限制，却使消费者无法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近年来贸易摩擦日趋严重，由于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贸易政策来惩罚或奖励别的国家，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了。

8. 财富的分配：20 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准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财富的分配，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在国家间依然分配不均。为减少这种不均而从事的某些努力有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取之于此人而施之于他人的做法，可能会降低促使这两者生产更多财富的刺激力。

9. 外国拥有不动产、公司和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当外国公民或实体购买某国的经济资产时，这些国家就会忧心忡忡。未来的利益将为外国人而不是本国公民所享有；更有甚者，由于重要决定是在国外作出的。一个国家可能会丧失对其命运的控制。例如，拥有美国债券的外国人如突然抛售美国债券，便可能破坏美国的金融市场，触发一场衰退。

日益增多的污染问题

10. 空气污染（从略）

11. 水的污染（从略）

12. 臭氧层损耗：臭氧层变稀，更多的人将受到紫外线照射的影响，包括皮癌和失明。许多粮食作物，如小麦、水稻和马铃薯也将受损害。

13. 温室效应：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的聚积，可能使南北两极的冰块融化，从而淹没世界各地的沿海地区。

14. 噪音：噪音量不断加大，使精神紧张和丧失听力的人增多。由于风钻、割草机、摩托车和其他发出噪音的设备，城市和郊区似乎越来越喧闹了。专家们说，喧闹的音乐使许多年轻人听力受到永久性的损害。

15. 固体废弃物问题：许多城市附近填埋垃圾的空间即将用尽，有关方面正在寻找倾倒垃圾的场所。在某些情况下装载垃圾的船只，从一个口岸驶往另一个口岸，以期得到允许它们卸掉装载的垃圾的许可。

16. 海洋：油轮溢出的原油、被垃圾或化学制品污染的河流以及将垃圾倒入大

海正在毒死海洋生物，并使大片大片的海滩和海洋遭到污染和受到破坏。由于原油和污水冲刷海滩，许多海滩可能不得不被迫关闭。

毒品危机

17. 麻醉品：最近，控制可卡因和其他麻醉品已成为美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制止现已变得很普遍的毒品交易，很可能需要采取非常严厉和耗资巨大的措施。有些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现在对贩毒者处以极刑。为避免被抓获，美国的毒品贩子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儿童贩运毒品，这一作法把新一代的人拉进了贩毒集团。

18. 犯罪：吸毒成瘾者为了满足吸毒的习惯而犯罪。毒品贩子为了继续进行毒品交易而贿赂官员，从而使甚至是高级的政府官员腐化堕落。

19. 毒品的合法化：由于对猖獗一时的毒品交易的后果感到无可奈何，有些人主张使贩毒“非犯罪化”。鼓吹这种观点的人说，麻醉品合法化会大大减少与毒品交易有关的犯罪和暴力行为。但是，哪些毒品应该合法化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才应该让这些毒品合法化？有些毒品，例如上等可卡因极容易使人上瘾。接受麻醉品试验的人很快就会变得离不开这些麻醉品，从而越来越成为不称职的工人、父母的公民。

20. 吸毒成瘾的母亲：吸食上等可卡因的母亲生下的婴儿的心、肺、消化系统、甚至肢体都是畸形的。婴儿生来就具有毒瘾，而且生命一开始就要经受毒品脱瘾而引起的种种痛苦。喝酒的孕妇生下的婴儿的智力可能终身受到损害（胎儿酒精综合症）。

21. 饮酒：饮酒也许是造成车祸和其他事故的最主要原因。酒后开车每年要撞死成千上万的人。饮酒也与火车、飞机、轮船、工业和其他类型的事故有关。尽管饮酒造成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但是电视每周都播放鼓励人们喝啤酒的商业广告，许多出版物中充满了说明喝葡萄酒和烈性酒是美好生活所必需的广告。

22. 吸烟：烟草制品使人的寿命缩短，然而烟草业却反对为减少吸这种毒品而作的努力。近几年来，医学部门把注意力集中在“被动吸烟者”方面，被动吸烟者是指那些不得不呼吸被香烟污染了的空气的人。年轻人继续受描绘吸烟者过着精力充沛和健康的生活的广告的影响。

日趋枯竭的资源

23. 能源短缺（从略）

24. 日益消失的物种：成千上万种动植物物种正在或将在今后几十年中消失，主要原因是它们的栖息地和生长环境进行了破坏。这些动植物中有许多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它们可以用于医药、食品和其他有价值的目的。

25. 耕地减少：过度种植、都市化和其他因素，正使全世界丧失赖以生存种植粮食作物的可耕地。土地的滥加开垦导致大量宝贵的表土随雨水流失。长远的后果可能是粮食成本上升，从而使穷人得不到足够的食物。

26. 日益扩大的沙漠：过度放牧以及砍伐森林和灌木充作薪柴，已使非洲的大片土地沦为沙漠。随着沙漠面积的扩大，人们忍饥挨饿或成为被国际社会收容的难民。

27. 缺水：在世界的许多地区，由于用水过量，水的供应来源在越来越少。例如，在美国西部，地下水位正在下降，从而导致水井干涸，农民被迫放弃他们的农场。城市居民面临着水价扶摇直上的局面，当局不得不定期采取紧急措施，以保存水源供必要之用。

28. 森林遭破坏：在世界各地，木材公司砍伐林木的速度快于新生林的成长速度。在南美洲，森林被砍伐和烧毁，以用来放牧和种植古柯。在欧洲和北美洲，森林由于还没有完全查明的原因而枯死，但是专家们认为主要原因是空气污染（酸雨）。

为消灭贫穷而斗争

29. 赤贫：即使在富国也有不只是贫穷而是赤贫的人，他们缺少为维持生命所

必需的基本必需品。在一些国家里，绝大多数人一贫如洗或接近一贫如洗。缓和他们的悲惨处境将是 90 年代的一个主要问题。

30. 饥饿：因饥饿而死的人相对而言为数极少，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营养，数以百万计的人变得身体极为虚弱，以致死于疾病。营养不够还导致儿童身心发育不全、发病率高和寿命缩短。

31. 无家可归者：在富国和穷国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没有自己的家。他们露宿街头，住在汽车和被人们丢弃的包装箱或地下室中。造成无家可归的原因包括失去收入来源、患精神病、与家庭疏远和居民区贫困。

32. 失业：近年来就业对教育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但许多工人在获得新技能方面落后了，从而不能被雇用，或接近于不能被雇用。其他工人之失业，是由于实行自动化或进口货物而导致经济衰退或工厂关闭。为防止失业工人生活困难，政府提供救济金。但救济金往往降低了激发失业者去从事低工资工作的动力，形成一批永久性的失业者。

33. 贫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经济条件造成的，但也很大一部分是个人行为所致：有的人有孩子但无力扶养；有的人贪图看电视而不学习，或被雇用后不努力工作。减少贫穷主要得依靠改变造成贫穷的行为模式，但要使人们作出改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34. 改革教育：尽管增加了教育经费，但是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在离开学校时并没有学到在现代社会里有效地发挥作用所必需的基本技能。然而，在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改进教育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学校中是否应更加强调纪律？每班的学生人数是否应再减少一些？是否应给有成就的老师发奖励工资？

猖狂的非法行为

35. 减少犯罪：一些社会思想家认为，教育和就业会消灭犯罪。但是，尽管支出了数额空前的费用以帮助人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和摆脱贫穷，犯罪率仍在上升，引起犯罪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能够着手消除这些原因从而使人们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吗？

36. 个人自由：在美国的边远地区，人们过去可以自由地开枪、砍树，随心所欲地乱倒垃圾。现在，由于越来越城市化、环境问题和其他一些正在改变的情况，这些自由必须加以限制。但是，对这些传统权利进行的限制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人们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们不能做某件过去习惯于做的事，或要求他们做某件过去他们并非一定要做的事。

37. 艾滋病受害者的责任：某些携带令人恐惧的艾滋病病毒的人可能没有把自己的情况告诉过性生活的伴侣。对于那些故意危害他人生命的人，社会将怎样加以处置？对于那些担心自己得了艾滋病而拒绝接受检查的人，社会又该怎么办？

38. 使用刑罚：现代社会已变得极其不愿意以使用严刑作为减少犯罪的手段。严刑拷打已被宣布为非法；死刑已很少实行；即使宣判了长期监禁也很少执行。在严厉的惩罚减少和犯罪增加之间有没有联系？在 90 年代，人们将与下列问题作斗争：惩罚是否应该增加？新型的惩罚是否会有助于保护社会免受罪犯的侵袭。

39. 知识产权：摄制一部电影往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但在一台录像机上就能非常便宜地把影片复制出来，而且在出售这些影片时无须给影片创作者支付任何费用。类似的复制问题还会损害音乐家、计算机程序编制人员、作家和其他人的利益。如果没有较好的手段来保护生产者的权利，要为生产高质量的信息产品筹措资金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40. 计算机安全：计算机业余爱好者能够接通新的电子信息系统，从而获取有关个人、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机密情报。防止未经批准便接通计算机网络将是一件越来越受到人们关切的事情。

41. 计算机误差：当一台计算机产生误差而造成严重损害时，应该把谁投入监狱或处以罚款？是计算机程序编制员？是计算机的所有者？确定责任是一件紧迫的

法律问题，因为出了差错的计算机可能浪费数百万美元。更严重的是，它能造成飞机坠毁，可使护士给病人发错药物。

人口问题

42. 人口增长：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增加破坏自然环境和降低生活水准。然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降低出生率。在未来10年中，制止贫穷国家的高出生率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43. 生育不足：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现负增长（移民除外）。在美国和若干欧洲国家，本国出生的妇女在她们的生育期生的孩子很少，甚至不能接替她们自己。这种低出生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妇女的低生育率，已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心。

44. 移居国外：人们从一个国家移居到另一个国家，对于他们离开的国家和进入的国家都可能产生问题。对于离开的国家来说，由于这些最有前途和最年富力强的人离开本国到其他地方去谋求更好的机会，它们要经受“人材的流失”。同时，接受的国家面临要同化这些新来者的问题，因为这些人不懂新到的国家的语言，也不了解它的风俗习惯。

45. 至关重要的人口统计数字：移居国外和出生率方面出现的差异，往往会改变一个国家人口统计的构成，因为属于某个少数民族集团或宗教的人口的百分比升高的同时，属于另一个少数民族集团或宗教的人口的百分比则会随之下降。这种变化可能会打破一个国家的政治平衡，甚至会导致内战，因为人口百分比增加的集团将开始要求改变那些长期以来所确定的做法，比如要求更广泛地使用其语言，要求为它所信奉的宗教提供更多的补助等等。如果反对作出这些改变就会导致流血。

46. 延长人的寿命：如果目前对衰老的研究取得成功的话，人的寿命可能会延长到大大超过目前人们认为是正常的寿命（70岁至90岁）的年限。可以想象，一些人可能会活到200岁或200岁以上。但那就会出现无数的新问题。比如，如果人们仍在60岁退休，然后要靠领取退休金再生活许多年，那么退休金基金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再者，人们会愿意与同一个人保持一个世纪以上的婚姻关系吗？

医疗方面处境进退两难

47. 保健开支：现代医药在医治病人方面所取得的惊人结果需要付出同样惊人的费用。如果一名患者付不起挽救他的生命的医疗费用，那么应该由谁来付这笔费用？是不是应该让他死去？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科学家们研究出越来越多的方法使人们能长寿和继续发挥作用，医疗保健开支问题正在日趋激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医疗服务无论如何必须加以限制。

48. 鉴别：人们往往不知道他们已患了需要治疗的严重疾病。对于患了象艾滋病之类的危险传染病的带菌者，必须加以鉴别，以免传染他人。但是，许多人都不愿接受鉴别，部分原因是他们担心会遭到歧视。

49. 提高智力的药物：能提高人的智力的药物可能不久即将问世。这类药物是只卖给那些无论厂家索价多高都能买得起的富人呢，还是应该由政府出钱购买这些药品，以便穷人也能提高智力，或是摆脱贫穷？

50. 配给人体器官：一些人正濒临死亡，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心脏和肾脏来对那些需要这类器官的人施行移植手术。谁最有资格接受肝移植？是70岁的慈善家？还是25岁的酒鬼？后者由于饮酒过度而损坏了自己的肝脏，还是说应该把肝脏移植给能出最高价钱的患者？

51. 艾滋病：这种致命的疾病有发展成为比中世纪的黑死病夺去更多人的生命的危险，它将提出许多极为痛苦的问题：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制止此病的患者再把此病传给他？谁应该为艾滋病患者所需的昂贵药物支付款项？

52. 堕胎：堕胎引起了许多困难的问题：如果一位妇女未能将胎儿打掉，尽管堕胎是胎儿父亲的愿望，而怀胎妇女又拥有合法的权利这样做，那么指望当父亲的来抚养婴儿，这样做合理吗？难道一位拥有合法权利的母亲不应该把一个患有可怕

的遗传性疾病的胎儿流产掉吗？

53. 灭婴：新生儿专家正成功地在婴儿年龄尽可能小的时候拯救他们的生命，不幸的是，这些婴儿有许多是严重畸形的，可能再也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往往是在违背父母的愿望和纳税人作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强行活下来的。灭婴的合法化可能成为 90 年代一个重要的问题。

54. 挑选所生儿的性别：医生们正在研究各种办法，使父母能选择生男孩或女孩。目前已经有可能来确定一个未出生的婴儿的性别，如果未出生的婴儿的性别不是父母亲所希望的，就可以接受流产手术。能做些什么事情来防止男女性别的比例失去平衡呢？有些国家，人们特别希望生男孩。如果没有某种规定进行限制，不久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占巨大优势的男人为争夺少数可以得到的女人而不断地展开争斗。

家庭破裂

55. 离婚：离婚人数在 20 世纪不断增加，70 年代上升得最为显著。今天，几乎每两对夫妇中就有一对以离婚而告终。离婚人数的增加使家庭破裂，而家庭是负责把孩子抚养成为好工人和好公民的单位。人们普遍认为，家庭破裂是造成孩子犯罪、学习成绩不及格和其他问题的原因。90 年代为帮助维持家庭而作的努力可能得到加强。

56. 单亲家庭：由于离婚和没有结婚便成为父母的情况盛行，为数极多的儿童现在只得到父母一方的照顾。他们经常得不到充分的爱和纪律约束，而且是在心理发育不全的情况下长大的。这些孩子中有许多都是任其自由发展，不知不觉地陷入游手好闲、吸毒和犯罪恶习之中。

57. 儿童遭到忽视：许多父母亲彻底抛弃了他们的孩子。另一些父母给孩子们的支持，远远少于孩子们为得到适当的发展所必须得到的支持。千百万儿童从父母那里得不到基本的训练，而这些基本训练是孩子们想要在学校、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许多被视为离家出走的儿童实际上是“被抛弃的儿童”，他们的父母根本就不想要他们。

58. 与社会隔绝：除离婚外，晚婚和独身的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成年人要靠自己料理生活。许多人在生病或丧失能力时，没有人对他们提供帮助。他们还可能发现自己越来越与外界社会脱节。

传播媒介的弊病

59. 信息超负荷：人们能够得到的信息量正在超过他们使用信息的能力。事实上，信息过多本身就在形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正如詹姆斯·瑟伯曾经说过的那样，“对每一件事情的论述是如此之多，以致于你会找不到对这件事的任何一点说明。”

60. 隐私：对那些为了正当目的而需要信息的人来说，信息应当是很容易就能得到的东西，但是，人们也希望维护他们的隐私权。这样就会产生严重的冲突。例如，在保健方面，对当局来说，了解某人是否得了传染病以便保护其他的人不得这种病是非常重要的事。但是，有时为了非法的目的也能弄到这类信息。

61. 有伤风化的材料：人们反对他们认为是淫秽的、反宗教（或支持宗教）的、在政治上有偏向的、鼓吹暴力或其他有伤风化的材料。但是，新技术使得要完全查禁这类材料变得越来越困难。激光印刷、影印和便宜的摄像机使几乎任何人都能成为出版商或电影摄影师，至少在有限的规模上是这样。有伤风化材料的传播，以及为审查这种材料而作的努力，在 90 年代无疑会造成许多争论。

62. 不真实的现实：电视现在使观众看到的是对世界各地发生的情况高度扭曲了的情景。在许多电视节目中，炸弹爆炸、暗杀和其他暴力事件往往居支配地位。记实剧对一连串事件进行有趣的叙述，但是观众得到的印象却可能非常不准确。学校的教科书中也出现歪曲事实的情况，因为编写这些教科书的目的是要取悦，或至少是避免触犯很可能提出反对意见的任何宗教、少数民族或其他集团。

63. 越过边界的资料流动：如果信息能够从提供信息的人流向任何地方的客户，就能节约大量成本。但是，许多国家担心，信息的自由流动会破坏它们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有的国家还担心丧失外汇，如果它们的公民从国外购买信息的话。倘若有关美国公民的信息储存在加拿大的电脑里，加拿大政府在发生政治危机期间就可能会理所当然地决定拒绝让美国当局得到这些信息。○

(施景柯 译)

米·卢·恰维奇

南斯拉夫领导人 收入知多少

南斯拉夫《政治画报》一九八八·十·六 塞文

我们的领导人常常要求人民勒紧腰带，通过自我克制来共同摆脱危机。所以我们人民也想知道，领导他们的人是否也在自我克制。

联邦主席团主席迪兹达雷维奇和联邦执委会主席（总理）米库利奇的月工资为 125.06 万第纳尔。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的月工资比他们少一些，因为他比较年轻，工龄短一些。联邦议会主席波波夫斯基的月工资为 143.01 万第纳尔。

官员工资的计算方法是，以 3.5 到 5 为系数，乘以南斯拉夫经济部门职工前三个月的平均个人收入，再加上工龄工资。

联邦执委会委员、联邦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席的工资计算系数是 4.1，社盟联邦会议主席的工资系数是 4.8，联邦工会主席是 4.5，老战士协会联邦委员会主席是 4.8，联邦青年联盟主席是 3.6。

根据计算，前三个月全国经济部门职工平均个人收入基数是 20.85 万第纳尔。那么，联邦执委会委员、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席的个人收入就等于 20.85×4.1 ，再加上工龄工资。

两主席团（党和国家）委员的工资系数均为 5。这就是说，最高领导机构的每位成员的个人收入都没有超过 125.06 万第纳尔。或者说，南斯拉夫任何领导人的月收入都未超过 400 美元。

而在美国，甚至失业者的社会救济金也高于这个数字！

那么，领导人除工资以外还享有其他什么补贴和权利呢？

官员们因办公事可以使用小汽车。除几位联邦主要领导人有权乘坐专车外，其他领导人均使用共同车辆。

此外，议会代表如因公乘飞机，往返机场也可以用公车。

在首都贝尔格莱德没有固定住处的联邦官员，均可以得到临时住房，但是在他们离任时必须搬出来。例如现任联邦议会主席居住的一间一套的公寓，就是上届主席住过的。公寓配有家具，居住者只需带个人用具就行。

联邦议会主席每月需付房租 11 万第纳尔，并上缴一定比例的家具损耗费。

此外，每位联邦官员每月可得到 15 万第纳尔的两地分居补贴。○

(云飞 摘译)